

Jiangou

Nengli

Shehui

建构能力社会

——21世纪中国人的发展图景

●韩庆祥\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

Jiangou

Nengli

Shehui

建构能力社会

——21世纪中国人的发展图景

●韩庆祥 著



DANGER 103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构能力社会：21 世纪中国人的发展图景/韩庆祥
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 12

ISBN 7-5406-5128-8

I. 建… II. 韩… III. 民族心理素质—关系—现
代化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②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2005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60 000 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406-5128-8/C·20

定价：20.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3796440

前言

Preface

社会历史越往后发展，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社会历史，说到底就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如果说农业社会主要是由血统、“关系”和权力配置资源，工业社会主要是由财富、金钱配置资源，那么，知识经济社会则主要是由知识和能力配置资源；如果说农业社会注重的是土地和体力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则注重的是资金和设备以及自然资源，而在知识经济社会，则更注重人的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注重的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人才；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推崇的主要是权力和“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推崇的主要是金钱，那么，在知识经济社会，则主要推崇人的

知识和创新能力；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主要是“官本位”，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主要是“金钱本位”，那么，知识经济社会奉行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则主要是“能力本位”，是“我能故我在”；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主要是权力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主要是金钱社会，那么，知识经济社会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能力社会。由此，在知识经济主导的时代，应实行文化价值观、社会观和发展观的革命，即：确立能力本位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建立一个能力社会，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能力建设；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也就是建立一种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内容的能力为本的发展观。

这就是本书所要发表和表达的核心观点，全书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观点而展开的。

韩庆祥

2003年11月于北京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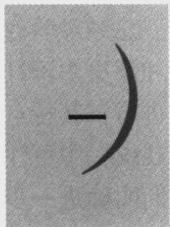
Contents

- 一、提高国民素质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1)
 - 1. 一条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国民素质…………… (2)
 - 2. 做好“正在做的事情”的先决条件：提高国民素质…………… (10)
 - 3. 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加强人的建设…………… (16)
- 二、研究“国民素质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法…………… (18)
 - 1.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18)
 - 2. 分析国民素质的结构及其现状…………… (27)

DAN 2/03
1)

| | |
|------------------------------------|--------------|
| 3. 以邓小平及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四有”新人的思想为指导····· | (30) |
| 三、培育适应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国民素质····· | (32) |
| 1. 智能社会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 (32) |
| 2.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伟大工程····· | (36) |
| 3. 当代中国国民素质发展的走向和目标····· | (40) |
| 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能力本位····· | (95) |
| 1. 哲学的功能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核心理念····· | (95) |
| 2.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能力本位及其根据····· | (100) |
| 3. 能力本位的基本内容····· | (133) |
| 4. 能力本位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144) |
| 5. 能力本位的实现····· | (173) |
| 五、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方式与具体对策····· | (179) |
| 1. 制度塑造与通过制度建设把人的行为引向有素质····· | (179) |
| 2. 体制塑造与实行市场机制····· | (196) |
| 3. 组织塑造与实行以人的能力为本的管理····· | (198) |
| 4. 文化塑造与加强文化建设····· | (231) |
| 5. 法治塑造与加强法制····· | (246) |
| 6. 政策塑造与采取具体的技术性措施····· | (247) |
| 7. 自我塑造与培养自律意识····· | (247) |
| 六、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论····· | (249) |
| 1. 对中国改革的人性前提加以科学理解····· | (249) |

2. 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的合理
确定 (254)
3. 正确对待物的因素（原则）和人的因素
（原则）的关系 (263)
4. 注重经济体制转型和人格转型的同步协调 (291)
5. 正确对待发展与代价的关系 (298)



提高国民素质 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 重大战略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提高人的素质是我国两个较为重要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在全局上和战略上把这两大问题联系起来。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①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郑重地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把文化建设同提高国民素质内在联系起来。这深刻道出了提高国民素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

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以说，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1. 一条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国民素质

从 1958~1978 年这 20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沉痛代价。这些代价促使我党认真去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党全部活动的起点，是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起点。这种总结善于从哲学高度进行，其特点和方法是：在内外因的统一中更注重内因，在主客观统一中更注重主观。这既有利于抓住问题的根本，也有利于人们明确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从而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主动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一些曲折，主要在于一些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受主观主义的影响，官僚主义、搞特权和家长制作风严重；在道德上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在能力上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本领；在精神上骄傲自满，等、靠、要，追求享受，缺乏创造积极性；在心理上注重拉“关系”、讲“人情”而破坏原则、规范和制度；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注重追求抽象的社会主义之名而轻社会主义之实，注重社会主义的“书本公式”而轻社会主义的“生活公式”，习惯于长官意志而疏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把握。不容否认，这 20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一些成就，而成就的获取缘于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和人才。1975 年，邓小平复出后抓整顿工作，他认为在这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他强调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好好培养。正因为他重用一些人才，才使整顿工作卓有成效。不难理解，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人的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要充

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①

不能完全正确对待国民素质，有其历史的深层文化原因，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方面是重“天命”而轻“人力”，重先天条件差别而轻后天能力差别。

先看看重“天命”轻“人力”这一方面。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受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的支撑和引导，这种理念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命运，而这种理念，主要是由哲学提供的。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核心理念。

中国古代的哲学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这种哲学为人生和社会提供的理念主要是“仁”、“义”和“情”。中国古代哲学占主流地位的是儒家的伦理哲学，儒家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和“恕庸忠孝悌”，其中仁为大、为首。仁义礼智信等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就是告诉世人追求“仁”、“义”和“情”，其一系列主导话语系统都是追求“仁”、“义”、“情”，诸如中庸、平和、整体、立德、安分守己、顺从、克己复礼、听天由命、谦和不争、均贫富、统一、小富即安、安贫乐道、阴柔无为、尚和、柔静、天人合一、和为贵、女子无才便是德、大同、不为最先和忠恕，就是如此。不容否认，以这种理念为核心文化所塑造的整个中华民族，在农业社会曾以一种特殊的姿态顽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维持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文化存在的局限性是缺乏竞争、开放、开拓、创新和法治，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绵羊”。正是这种缺乏创新基因的文化理念，导致了近代中国以来社会发展的缓慢和落后。因为这种理念导致中国人的封闭、保守和僵化，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扼杀了人的自我创造精神。正如严复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和李大钊所说的，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委天数，而西方人恃人力，中国人事事听天命，西方人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鲁迅说，天命乃是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护符，它使得一切苟且偷生、敷衍的行为“无往而合乎圣道”，从而导致中国落后。陈独秀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所以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就在于“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无论何事，都是听天由命，不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的。因此国家衰弱到这般天地，还是懵懵懂懂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

现代以前的西方哲学是着重研究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智慧哲学，这种哲学为人生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核心文化理念是“利”、“力”、“理”和“立”。古希腊哲学的精神首要是理性精神，文艺复兴时期复兴了这种精神。理性至上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其中既发现了人的世俗欲望并赋予其合理性，简称为发现了“利”之价值，又发现了人的能力对满足世俗欲望的重要性，即发现了“力”之价值，也发现了规范和引导人的利益和能力的理性，即发现了“理”之价值，还发现了人的后天努力奋斗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即发现了“立”的价值。在近代哲学中，利、力、理和立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原始动力，能力是满足人的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理性是规范和引导人的能力发挥以满足人的利益的规则和尺度，自立是最终的结果。这种哲学理念的基本精神，就是鼓励和倡导人们开拓、竞争、拼搏、进取和创新。一系列主导话语系统都是追求这种基本精神的。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个性、人权、自由、意志、征服、改造、自我和进化等就是如此。无可怀疑，以这种理念为核心的文化使西文社会付出不少代价，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环境污染等，但从其主导方面

看，这种进取型的文化极大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大大超过了我们。质言之，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快速发展得益于哲学为其提供的四大理念：利、力、理和立。

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仁、义、情和利、力、理、立，但在不同社会，总是由某一种理念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在古中国是仁、义、情，在近代西方则是利、力、理和立。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哪种理念应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只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仁、义、情这些哲学理念是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提升出来的，也有它产生的经济基础。而利、力、理和立这些哲学理念则是从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中提升出来的，也有它的经济基础。然而，以仁、义、情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早熟”性的文化。说它早熟，是说在贫穷基础上的仁、义、情，其作用和价值是有历史局限的，一定意义上还可能出现伪善，因为人们在贫穷的情况下会更加追求利，且是羞羞答答地追求利，披着仁义的外装去追利。在利、力、理和立之理念的实现过程中，在发达富裕的基础上，在社会巨大发展进步过程中着力去解决代价问题时，仁、义、情将会显得更有效、更有力和更有价值，人们也更会自觉去实现仁、义和情这些理念。所以离开利、力、理和立的仁、义、情是早熟的，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实现利、力、理和立之理念的过程中强调仁、义、情，则更显示其价值。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追求利、力、理和立之理念是一种历史进步。如果我们较早承认这些，就不会落后这么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比我们较早地发现了利、力、理和立之秘密。在利、力、理和立四者当中，“利”之理念是最容易且已被人们接受和追求着的，“理”之理念业已被倡导和强调，如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法制，这都是理性精神的要求。惟有能力和自立之理念，人们对

其意义和价值还注意不够。其实，能力和自立之理念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来说，是最需要的，但也是最缺乏的，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权本位、人情本位和“关系本位”，注重年资和“名分”等，都是“能力”和“自立”理念的大敌，是敌视能力的，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突出能力和自立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再来看看重先天条件差别轻后天能力差别这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在 1958~1978 年这 20 年间，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比较看重人的先天条件的差别，诸如“出身”、“成分”、“阶层”、“财产”、“门第”和“社会关系”等，轻视人的后天努力和能力的差别。农民出身就不如工人出身，工人出身就不如国家干部出身，一般国家干部就不如高级干部。这种先天出身成分的不同使他们在后天社会生活中要么坐享其成，要么“近水楼台先得月”，至于人的后天努力和能力方面的差别，倒是给予轻视了，后天如何努力和发挥其能力，如何为社会做贡献，在“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面前，大都显得微不足道。这种重先天条件轻后天能力的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写证：有房有屋，不如有个好父母，努力能力不如有权力，有能有绩不如有人有关系。这种现象叫做：重先天条件差别，轻后天能力差别，对先天条件讲差别，对后天能力搞平均。这种对人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抑制着人的后天努力和能力的充分发挥，也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承认不承认人的后天努力和能力及其价值的差别，既涉及到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问题。因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落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重先天条件差别轻后天能力差别。这在一定

程度上带有封建主义的遗毒。

一个社会要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遵循这样一条规律：重后天能力及其价值差别，轻先天条件差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人后天努力和能力发挥在起点、机会和条件上的相对平等，才能给每个公民及其出类拔萃者以“出人头地”的机会，而这才能激励和鼓励人们的后天努力，才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能力，才能积极主动地为社会而工作；相反，如果注重先天条件，只能扼杀人的后天努力和创造潜力的发挥。正如英国著名改革家 R.H. 托尼（1880~1962 年）在《论平等》中所说：“一人尊重平等的社会，只重视不同的个人之间在气质和智力上的差别，而轻视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差别。社会在贯彻其政策和构建社会组织方面将会努力去鼓励前者，而抵消和压抑后者。”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以能力为本的“能力本位”社会，这种能力社会尊重每个人的后天努力、能力发挥及其产生的不同价值。

历史证明：重后天能力差别轻先天条件差别的社会，就能快速发展，反之，重先天条件差别而轻后天能力差别的社会，发展却比较缓慢。中国在先秦和隋唐时代，本是世界领先的。中国在先秦和隋唐时期兴盛于世，靠的是民族实力，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世界文明古国，是由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有素称较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由此，18 世纪的欧洲兴起一场“中国热”，即热衷于中国的艺术、建筑、园艺和陶瓷等。随着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1760 年《礼俗论》的发表，对中国的推崇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和“爱屋及乌”之境。日本人崇拜中国人的智慧，并且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也总是求诸于中国人的权威。德国思想家和诗人歌德崇拜中国人的户外生活、建筑、道德

礼仪和温静而平和的性格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崇拜中国的哲学及政治价值。他在1697年所刊的《中国新论》导论中，提议“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因为他认为中国经世致用的哲学及政治价值优越于西方或欧洲。伏尔泰赞美中国人的文明，认为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波维尔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全赖于是否能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于是，他怀着迫切而激动的心情说：“到北京去！”这些欧洲思想家以其恢宏的气魄和开放的胸襟崇拜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崇拜古代中国的道德礼仪，但内在的却是由于古代中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政治方面的组织和施政能力、文化力和道德力，古代中国凭实力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然而，隋唐之后，虽然历代都有新的东西贡献于世，也出现过“中兴”、“盛世”的局面，但往往都是昙花一现。而到近代，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开始放慢甚至停止，明显落后于西方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小渔船遇到了世界最大的军舰，中国的大刀长矛遇到了英国的坚船利炮。这种落后，迫使许多中国人到国外去当劳工谋生，这些劳工被称为“苦力”、“猪崽”；在美华人也备受欺凌；在美国电影上，中国人的角色总是以邪恶的面目出现；美国罗斯福总统说中国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美国哲学家埃默森说：“中国在万国集会上所能说的一切必然是我生产了茶叶。”不言而喻，中国在近代失去了民族尊严。深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在经济实力上的衰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软弱无能，文化也失去了影响力；并由于实力的丧失导致了民族尊严的丧失。

由于封建社会重先天条件差别（门第、血统、出身、等级、社会关系、嫡亲等）而轻后天能力差别，平民大众的创造才能遭到了抑制，所以后来落后了。而西方从文艺复兴以后，比较注重人的后天努力和能力，反对前定既定，人的创造才能得到了发

挥，所以超过了我们，大大发展了。在“文革”10年期间，我们对人特别注重讲出身、成分、社会关系，人被束缚住了，没有什么积极创造性，社会发展停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打破了套在人身上的枷锁，为人松绑，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破除“成分出身论”。正如著名作家张贤亮所说，这对推动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作用，它给每一个中国人敞开了社会的大门，将所有的人置于社会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是社会的主人；不再强调每个公民的“出身成分”，这意味着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不分资本，不分资格，在人民中间根据努力、能力和贡献大小评选优秀人物来补充政权领导层成为可能，民主政治的曙光就从这里升起了，在我看来，人的平等曙光也从这里升起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了解放感，有了“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人的积极创造性和活力便由此而生。因为人之为人，关键是社会要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竞争和自主选择的机会。

由此必然引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四平八稳、善拉关系结人缘的平庸干部与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但“有争议”的铁腕型干部？重后天能力差别，以能为本，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凭能力开拓进取和拼搏竞争，这意味着要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敢于触动一些人的势力和既得利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需要这种铁腕式的干部。然而，这种干部往往是“有争议”的干部——对这种干部议论多、意见多和告状多。然而，目前我国的一些组织人事部门恰恰容易对这些“有争议”的干部暂搁置不论，不重用，因为这种干部有点“吃不准”、“群众意见大”。相反那些四平八稳、不坚持原则、善拉关系行人情结人缘不得罪人的平庸干部，有时却仕途腾达，官运亨通。这样的具体运作方式，结果使一大批优秀人才从官场上退出，而一批平庸的人却稳